



The Essays of
Cantonology
(2018, Vol.1, Issue 4)

当代广州学 评论

(2018年第1期 · 总第4期)

涂成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涂成林 主 编

The Essays of
Cantonology
(2018, Vol.1, Issue 4)

当代广州学评论
(2018年第1期 · 总第4期)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序排序)

- | | |
|-------------------|-------------------|
| 卞 利 (南开大学) | 曹建文 (光明日报社) |
| 陈桂炳 (福建泉州师范学院) | 陈剑晖 (华南师范大学) |
|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 陈泽泓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
| 丁旭光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 方家忠 (广州市广州大典研究中心) |
| 丰子义 (北京大学) | 顾润清 (广州市政协) |
| 郝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 | 何一民 (四川大学) |
| 胡巧利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 纪德君 (广州大学) |
| 鉴传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 | 李 翔 (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
| 林少川 (福建泉州学研究所) | 刘小敏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 刘晓明 (广州大学) | 穆荣平 (中国科学院) |
| 欧阳知 (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 | 邱 捷 (中山大学) |
| 屈哨兵 (广州大学) | 沈 奎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
| 孙 麾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谭苑芳 (广州大学) |
| 涂成林 (广州大学) | 涂文学 (江汉大学) |
| 吴开俊 (广州大学) | 谢博能 (广州市政府研究室) |
| 谢曙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
| 徐吉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 杨 耕 (北京师范大学) |
| 仰海峰 (北京大学) | 衣俊卿 (中共中央编译局) |
| 张宝秀 (北京联合大学) | 张其学 (广州大学) |
| 张兴杰 (华南农业大学) | 张跃国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涂成林
编辑部主任 谭苑芳 丁艳华

责 任 编 辑

黄 旭 汪文姣 周 雨 粟华英 魏高强 尧 欢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字母序排序）

陈其和（广州大学）	陈佑武（广州大学）
傅元海（广州大学）	葛海彦（中央编译出版社）
龚伯洪（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黄石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李 钧（《城市观察》杂志社）	李克伟（广东省经企联）
李颂东（广州大学）	李文新（广州市政府研究室）
刘聪敏（广州大学）	卢护锋（广州大学）
马智慧（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聂衍刚（广州大学）
彭诗升（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饶 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任文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汤 萱（广州大学）
王 朋（广州大学）	肖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
肖坤学（广州大学）	谢海宁（岭南美术出版社）
姚俊生（广州大学）	尹 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郑念军（广东美术学院）	钟洁玲（广东科技出版社）
周林生（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	

发刊词

当今世界，国际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而城市间的竞争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故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不断涌现，并逐渐从特色城市研究（如敦煌学、延安学）过渡到对重点城市的综合性研究。于是，以国际知名城市或特色城市为研究对象，深入城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问题，试图构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尝试，在国内外不同城市和地域迅速展开。国际上出现了“伦敦学”“东京学”“巴黎学”等学科研究，国内则有“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武汉学”“成都学”“泉州学”等方兴未艾，渐成声势，并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然而，当我们反观广州这个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城市时，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长期雄踞国内综合实力第三位的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海内外学界对广州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直到前些年仍鲜有人提出研究“广州学”的明确倡议，也很少见“广州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不仅与广州当下在国内的总体实力和城市地位不相称，也与广州自秦代以来一直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综合门户城市的地位不相称，更与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地位不相称。可见，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城市发展趋势和广州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开辟“广州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必要，而且及时。

值得欣慰的是，广州在 22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虽然城市定位与功能多有变化，但其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这使得广州在中国对外商贸、对外交流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果我们以“Canton”为关键词搜索海外研究广州的资料和成果，就会发现关于广州的史料和研究卷帙浩繁，不胜枚举，特别是近 400 年来国际学术界不乏研究广州的高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再加上国内千年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学界广州研究的浩瀚成果，不仅为“广州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广州学”的成熟确立

了国际视野，开启了“广州学”无限发展的可能。

因此，就有了研究“广州学”的倡议和探索，就有了“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的制度建构与安排，它将扭转和改进当下广州研究中研究机构条块分割、专家学者各自为战、研究成果重叠分散的现状，从学科高度和学术框架来统摄广州研究的不同方面，并遵循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广州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规划。

因此，就有了“广州学论坛”的举办，就有了《当代广州学评论》的诞生，它将作为“广州学”协同创新的公共平台，汇集海内外“广州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努力汇聚和传播“广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广州学”研究的高端学术品牌。

衷心期望海内外学者关注和参与，让我们共同见证《当代广州学评论》的发轫、成长和成熟。

《当代广州学评论》编辑部

2015 年 10 月

目 录 Contents

学科前沿

新兴学科视野下的广州学构建路径	涂成林 / 3
地方性、开放性与文化性	
——广州学的地域特点与全球魅力	黄元丰 / 13
地方性的追寻：一个地方学基础议题及其研究路径	梁柠欣 / 21
肯·威尔伯整合视界下的广州学多维研究策略	
——以宗教为例	段新龙 / 35

广府文化研究

浅议广府文化中的七夕乞巧文化	刘小玲 / 47
香港新武侠艺术的广府文化渊源	李跃峰 / 58
岭南典籍中的“疍民”	
——以《广州大典》史部图书为检索线索	李 文 / 73

海上丝路研究

“一带一路”视野下广州水上居民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	谢棣英 郑少霞 / 81
-----------------------------------	--------------

释、道视角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羊城觅迹	饶原生 / 92
广州通事 (1730~1830) 研究的文化含义	高文平 / 100
乾隆末年荷兰使团表文争议始末	蔡香玉 / 114
清代广州海幢寺外事活动探析	邢照华 / 137

城市形象研究

广州城市形象定位的历程与目标	吕拉昌 孙飞翔 / 149
广州学在广州城市文化形象塑造中的意义刍议	黄旭 / 159
广州的“城”与“人” ——论 19 世纪中叶近代岭南报刊的“广州形象”建构	龙其林 / 167
泰国和越南留学生对广州城市形象的感知对比	徐洪 崔淑慧 / 177

城市综合研究

城市建设与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广州为例	姚华松 / 189
贸易政策对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	汪文姣 / 200
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地传承“广州模式”探析	吕慧敏 / 213
20 世纪以来广州行政区划演变研究	卢道典 黄石鼎 宁超乔 / 223
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正当其时	魏颖 邱志军 / 235

史海钩沉

陈炳权先生与私立广州大学史实考述 ——以陈炳权《大学教育五十年》为中心	吴小强 / 251
从新见信函谈国立中山大学初创时期的两件事	程存洁 / 266
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广州市工商青年积极分子研究	黄利新 覃政力 / 286
《当代广州学评论》稿约	/ 301

学 科 前 沿

新兴学科视野下的广州学构建路径^{*}

涂成林^{**}

摘要：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都包含了“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两个方面。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体系构建也应按照新兴学科的内、外在建制的基本规律，着重推进学科理论体系、开放性学术平台、大学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区域与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制等领域的建设。

关键词：广州学 学科体系 内在建制 外在建制

20 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某个重要城市所在地为研究对象的都市学开始兴起。当前，伦敦学、巴黎学、东京学、罗马学等已成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显学。在国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波涛汹涌的城市化进程也催生了我国城市学的发展，目前已先后有上海、北京、杭州、广州等 50 多个城市开展了以本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发展特质和演进规律的城市科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近年来，广州学在地方政府的扶持和诸多学术机构、研究学者的参与下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重要进展，但总体而言，广州学研究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广州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学理逻辑、理论范式等都需要进一步厘清与确立。因此，加快构建完善广州学学科体系，仍然是今后一个阶段广州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和努力方向。

^{*}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东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城市综合发展决策咨询团队”研究成果。

^{**} 涂成林，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负责人。

一 新兴学科构建的内在逻辑

费孝通先生在 2000 年谈到社会学学科建设问题时就曾提出,“从内在建制来看,成熟学科要求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较成熟的、得到公认的学科范式;从外在建制来看,学科成立的标准则表现为有专门的学会,独立的研究院所,单设的大学的学院、学系,专门的刊物和出版机构,图书馆中的专设图书序号等”^①。2009 年发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第一条也有明确规定:“本标准所列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

从上述评价成熟学科的标准体系可以看出,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都需要包含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两个方面。其中内在建制的主要内容为学科领域的理论体系与知识系统的建构,包括确立研究对象、内容框架、学科定位和研究方法,形成系统的学科框架体系、特定的理论体系和得到公认的学科范式,其主要目的是构建起清晰的学科边界,凸显该学科的独特性,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外在建制的主要内容为学术研究与传播平台的搭建、学术团队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构建,如成立学会、独立研究院所、学术刊物、大学院系与教育课程、学术交流平台等,其主要目的是彰显学科的学术存在和社会影响力。从内外建制的发展进程上讲,内在建制是新兴学科构建的逻辑起点,一般要先于外在建制,而一些典型外在建制的完成却往往是现代意义上独立的新兴学科正式确立的标志。但这并不是说只有等内在建制完善完成后再开始外在建制工作,两者其实相辅相成。学科理论体系与知识系统的构建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积累过程,外在建制的推进往往有助于内在建制的成熟完善。

以西方传播学学科创建的历程为例。早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随着电影和广播技术的出现,哈罗德·拉斯韦尔、纳夫齐格、拉扎斯菲尔德等一批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就开始了大众传播问题的研究,

^①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学科、教材建设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第 2 期。

并取得了传播研究的五大问题、“把关人”理论、二级传播理论等重大研究成果。1947年,美国学者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在1949年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辑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资助招收传播学博士生,至此标志着西方传播学正式创建成功。虽然至今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内在建制的知识体系的系统严整性方面尚存争议,就连西方传播学科的创建者施拉姆自己也认为“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field)而不是一个学科(disdiscipline)”^①。但施拉姆关于新兴学科构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值得深思的,他认为,“传播是否会发展为像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那样的学科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比这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地成为激发学术创新的中心,成为学者们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工作、发表成果和开展论争的场所,成为学者们整合其有关传播性质及其特殊性的思想见解的地方”^②。

再以上海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历程为例。早在1980年,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的江闻道先生就提出了创建上海学的问题,开启了以上海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上海学创建进程。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家以城市学科命名的“上海学研究所”,并举办了国内首次以城市地方学为主题的“首届上海学讨论会”,从此上海学研究进入快车道,虽然争议颇多,但在上海学界说、上海学历史、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国际学术界对上海史的研究也繁盛空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海内外学者共出版上海史著作240部,发表论文259篇,以上海史为题的博士论文有323篇。^③2003年,上海大学在国内高校中首次开设“上海学”课程,具体内容包括城市研究的理论及流派、“海派文化”与现代上海城市人格的形成、上海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上海城市传播结构的演变、上海的经济与市场、上海与国内外城市的比较等。在此以后,上海学也开始从以“上海史”为研究对象的上海学向以“上海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上海学转向。现在的上海学,无论是依托于历史研究的“上海史”研究,

① 程金福:《怎样创建一门新学科?——以“商务传播学”创建为例》,《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2期。

② Wilbur Schram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 Restrospective 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ummer1983: 16.

③ 熊月之:《上海学平议》,《史林》2004年第5期。

还是受到更多追捧的强化区域研究的“上海研究”都硕果累累，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①由此也可以看出，上海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是在内外建制相互交织中推进的，内在建制夯实了上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理基础，而外在的体制化建设则在不断提升上海学学科的社会存在感和社会影响力，并极大促进了国内外上海学学术研究力量的加速集聚，不断反哺上海学学科的内在建制，形成了一种可喜的良性互动。

二 广州学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要创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一般而言在起始阶段就需要满足三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明确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二是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与社会价值，有较为强烈的社会需求；三是已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稳定且具一定规模的研究力量。从这三个基本条件来判断，创建广州学的学科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第一，广州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城市经济总量长年稳居国内城市第三位，在全球 361 个城市中位列第 40 位，在我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广州作为一个远离中原地区、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城市，是岭南文明的中心地、海上丝路的起源地、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中西文化冲突最为激烈、融汇最为彻底的城市之一，拥有独特的岭南文化、商贸文化、近代革命文化、国际移民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可见，以广州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的广州学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研究内涵。

第二，从学术层面上看，广州学的创建可以加速国内外学术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分散的学术队伍的集结协作，有利于引导海内外人士关注广州、研究广州，可以更好地协同多学科对广州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研究。同时，也可以依托广州学的研究打造服务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体系，推动高校的协同创新与学科建设。另外，广州学作为城市学（区域学、地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创建有助于城市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知识体系

^① 曾军：《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学术界》2011 年第 12 期。

的完善，对促进我国城市学的研究进程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从社会层面上看，广州学研究可以深度梳理和研究广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增强城市的文化底蕴。同时，广州学以历史的视野回应当代的城市问题，可以全方位为地方的建设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不仅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建设全球网络枢纽城市、提升广州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等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而且有助于广州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另外，从学术层面推动来推进广州与国内外城市的深度合作，有助于真正形成一套能代表广州话语权的知识输出体系，对提升广州的对外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第三，国外研究者关注广州、研究广州自清朝的“五口通商、一口独尊”的“十三行”就已开始，在广州的宗教文化、商贸文化、人口特征、城市生活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如：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的《五口通商城市游记》记录了清朝时期广州的宗教文化；Henri Cordier（1902）从广州洋行商人的研究中反映广州早期的商业文化；C. Imbault Huart（1896）研究了清末广州的人口构成；Hugh D. R. Baker（1990）研究了1860年至1930年广州女儿婚姻模式和在南中国经济的战略，等等。广州学概念正式提出以后，近些年来在广州学研究领域更是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不仅广州大学和相关机构已出版和即将出版多本《广州学引论》《广州学导论》之类的书籍，而且出版了两种广州学论文集，广州大学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还推出了系列的《当代广州学评论》，此外，广州大学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已经或计划推出《广州学研究丛书》（三种）、《广州万象丛书》（三种）以及《广州学译丛》等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团队建设方面，通过广州大学各学科科研资源整合形成了广州学研究的主力团队，包括广府文化研究团队、岭南音乐美术研究团队、十三行研究团队、广州发展综合决策咨询团队、广州社会工作研究团队、广州文献资源研究团队等多个“广州学”研究的学术团队；在研究平台建设方面，广州大学以协同创新工程的方式成功申请了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学协同创新重大项目”、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成立了“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并自2014年开始邀请全国各地相关研究专家连续举办了四届“广州学论坛”；在课题研究方面，广州大学已开始面向校内各学院进行广州学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的招标活动，并与广州市社科联以